



《爭氣》

鼓舞人心

香港院線一向好少放映紀錄片，即使如奧斯卡得獎紀錄片也乏人問津，只有兩三間戲院肯上。紀錄片曲高和寡，唔得觀眾歡心，院商不敢貿然放映，變相苦了拍攝者，大眾自然更難接觸這類題材。但即將上映的《爭氣》，一反近年紀錄片難入院線的「常態」，十幾間戲院肯放，對紀錄片工作者無疑是一種鼓舞。

《爭氣》不說甚麼大道理，只是簡簡單單紀錄學生排演音樂劇的過程，他們如何在導師的指導下，自我的省思中成長、蛻變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■楊紫輝 伍麗微 攝

導演楊紫輝的名字大家不會陌生。她拍過以香港回歸為題的《風雨故園》，後來鏡頭伸展至內地，追蹤安徽阜陽市潁州地區的愛滋病家庭，將不為外人知的愛滋個案拍攝成《潁州的孩子》，她更憑此片奪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。此後，她一直挑戰拍攝不同題材的紀錄片，如紀錄內地同性戀者生活的《彼岸浮生》、見證華人變遷與離散的《聲光轉逝》等。

《爭氣》無疑是楊紫輝眾多紀錄片中「格局」最小的一部，但她說「電影以小見大」，透過排練音樂劇反映時下教育制度的利弊，及學生、老師與家長間的關係，意味深長。

藝術改變人心

看《爭氣》，很難不折服在楊紫輝溫柔的鏡頭下。事情回到2013年年頭，社企L plus H Creations打算排演《震動心弦》音樂劇，楊紫輝當時還沒決定要拍紀錄片，只是建議他們招收一些中學生把過程紀錄一下。後來音樂劇開始排練了，她被其中一幕——導師Emily指導失明學生子諾練歌的情境打動了，毅然決定接拍。

事實上，L plus H Creations找來合作的學校也很特別，均是弱勢學校，包括心光盲人院暨學校、聖公會蔡功譜中學、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及聖公會聖匠中學。「這些學校一般沒有資源做藝術教育，尤其是心光學校，他們比其他學生多花三至四倍時間去學習。」一群band 3學生與盲人學生一同演出音樂劇，當中所擦出的火花及彼此間的啟迪可想而知。

《震動心弦》於去年九月公演，反應轟動，今年L plus H Creations再接再厲，與心光及另外四間學校合作，製作《逆風》音樂劇，口碑依然。楊紫輝除了紀錄製作過程外，更是攝製組的導師，與學生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。「去年整個暑假都跟着他們跑，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去看他們。」她不無感觸。

香港新一代常被標籤，九十後、千禧後等字眼除了概括一個年齡組群外，不無貶意。但楊紫輝在這次經驗中卻看到這群邊緣化的學生「與其他人並無不同」，反而覺得他們有很多「可能性」。阿博、肥然、子諾、Coby等學生雖然各有不足，但在幾個月的排練裡，對於生命生活都有了新的看法。

為何一齣劇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？「一開始導師也不知道如何教，因為他們的專注力好差，他們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教，中間其實很氣餒，但當他們找到真正喜歡的東西後，便有變化。不同學校的學生互相影響，他們開始對自己要有要求，發現原來表演可以這麼好玩，他們自然會做得更好。」

培養紀錄片人才

幕前一眾學生參與，幕後也少不了學生。楊紫輝今次亦第一次同學生合作拍攝，幾個中學生跟着她學習如何拍片，在她決定接拍電影之前已開始紀錄一切。「這些中學生，喜歡一件事的話，

會落力去做。」初期六個學生參與，後來有兩個退出了，其他一些喜歡攝影的，幾個月下來，充實得不得了，如同楊紫輝所言，「喜歡藝術的話，他們不會捨得走。」

本地從事紀錄片工作的人不多，大部分都是業餘、玩票性質，這次楊紫輝之所以與學生合作，也是希望透過實際拍攝來培養人才。目前她是香港大學的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，致力在校園內推廣紀錄片拍攝，「我想教一些有興趣的學生拍紀錄片，他們如果有拍攝目標的話，可以找我做監製。」毫不吝嗇指導學生的她，其實很忙，整天都有人想找她拍片。

「我要休息一下，去找一些自己真正想拍的題材。」不想拍時事、政治題材，又不想拍廣告宣傳片，但拍冷門的東西又沒有太多資金，左右為難。《爭氣》難得有利希慎基金及一眾明星支持，未上映已贏得口碑，多間學校公司包場放映，「我期望很高，希望更多人自願買票進場。」



影評

《假面》電影精神分析的範本

早前在香港藝術中心 agnès b. 電影院看了瑞典導演英格瑪·伯格曼 (Ingmar Bergman) 最抽象晦澀的電影作品——《假面》(Persona, 1966)。《假面》自1966年拍成以後，一直都是電影精神分析的範本和電影現代主義討論的熱門電影。法國學者雷蒙·貝魯 (Raymond Bellour)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《假面》成為現代電影的條件。他考慮到羅蘭巴特 (Roland Barthes) 從「第三義」(The third Meaning) 以艾森斯坦影片中的畫格 (photogramme) 提出「顯義」(obvious meaning) 與「鈍義」(obscure meaning)，到《明室》(Camera Lucida) 轉為「知面」(studium) 與「刺點」(punctum) 的思維過程，特別將靜止影像具有的時間性、運動特性與凝思性納入電影分析當中。蘇珊·桑塔格 (Susan Sontag) 也曾明確指出《假面》所講述的是電影的「自我吞噬」，而這也正是《假面》作為現代電影的條件。

如果你不懂蒙太奇 (Montage) 呈現的後現代風格，不太懂《假面》的「物件隱喻」，對於電影探討的「人性」也不太有敏銳的觸覺，我勸你最好就不要碰英格瑪·伯格曼的電影作品。你必須像蘇珊·桑塔格懂得從美學角度欣賞這部外表看來生硬尖銳、冷靜殘酷、時而獨立、時而連貫的電影作品。也許英格瑪·伯格曼的任何電影作品都是一首朦朧詩，它要是「不求甚解」，任何過多的單面化詮釋都是徒勞諷刺的，它是導演內心最幽深的潛意識再現，你不可能完美無缺地解構「他者」的電影作品，這注定是「宿命的敗北」。正如一個現實主義的詩人寫不出「朦朧派」新詩，而一個「口水多過茶」如Woody Allen《Whatever works》式的政治家或哲學家注定有荒誕派的喜劇結尾。

《假面》裡的「物件隱喻」，總能體現一種極端的電影視覺和聽覺效果，如無聲喜劇片的片段（似卓別林的默劇作品）、蜘蛛（是英格瑪·伯格曼早期電影的重要符號，令人想起英格瑪·伯格曼的《對鏡猜謎》）、瑞典冬天陰森的森林、生鏽的欄杆、乾巴巴的死屍、被錘釘到血色斑駁的手掌（象徵基

督教）。開頭那個病態的瘦小男孩，起居皆在空病房裡，慘白色的電影畫面令觀眾聯想起停屍間，這病態的小男孩觸摸着一張模糊的女性面龐（代表母體子宮），影片似在探討另一層次的人性問題——「戀母情慾結」。

導演刻意營造出一個與世隔絕的病態生存空間，似進入毫無生氣的「無人荒島」，而呈現這個隔離空間的電影符號盡在電影現實與虛構中浮沉，極具美學感觀體驗，令人感受到導演的「極簡主義風格」在這部電影中發揮到極致。英格瑪·伯格曼敏捷地捕捉了兩位女主角Alma跟Elisabeth的孤寂且變態的內心變化，在一個又一個的「物件隱喻」中，她們的人生不斷重疊，不斷交換內心的秘密與身份，Alma跟Elisabeth這兩位「二合為一」的瑞典女人最終一步步邁向自毀的命運。

毫無疑問，導演英格瑪·伯格曼通過《假面》解構自己又重建自己，告別破舊的「停屍間」和「基督教」的陰霾人生階段後，通過隱喻重新定義新的自己。而英格瑪·伯格曼在拍攝《假面》前生過一場大病，影片中「病床上的小男孩」，代表了那時生病的自己，也代表了不安的自己。

《假面》這部電影重新回到探討「人性的命題」。希臘語「persona」的原意就是演員臉上的面具。那就是超離現實才可看穿現實，並徹底打破演員的面具。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，潛意識具有能動現實，會使人變得虛偽無助。美國的越南戰爭、猶太人被納粹屠

殺、西方文化中的性原罪等，在英格瑪·伯格曼的電影中歸納為對「人性的疑惑」。他將這作品當為現實的「persona」，且以「解構」使一切歸於「虛無」，使影片走向「宿命的死亡」。它告訴每一個人總有一天，我們會如此厭倦虛假的人生，而讓「本我」最終擊碎了面具，得到真正的「解脫」才是藝術電影唯一的真理。



文：張心曼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立體抗爭電影

多年前的抗爭電影《烈火風暴》有這麼一幕：主角被人打了，但被誤會是警察所為，於是他順水推舟，成為眾人眼中的抗暴英雄。

《烈火風暴》裡的主角西蒙本是只有世俗價值的普通學生，就像《逆權大狀》中的律師一樣，「理想」便是賺錢成功，換言之根本不懂理想為何物，然而，他們都因為置身於不義的環境，被某些事改變了自己，走到最前線，向建制和國家機器說「不」。

革命如同世上所有事一樣，有漂亮的一面，也有陰暗的一面，對此，《烈火風暴》沒有迴避，一個普通人為甚麼當上了學運分子？因為有着數略。有掌聲，有美女，有刺激……裡面有虛榮、自私、貪婪……所謂立體，所謂全面，便是把事情多角度呈現出來。

理想的實現者是人，人有缺陷，所有理想的實現不會完美，連耶穌上十字架，都曾有軟弱的一

刻。然而，這些缺陷、軟弱、黑暗無損理想的價值，不是功過比例的問題，而是兩重世界的斷裂與相應的辯證問題，沒有理想的人會傾向把複雜的辯證化為一層，最簡單便是抹殺理想。

革命會被人抹黑，革命者人格有問題便會拖累革命？有時會，有時不會。情形就像沒有人會因為孫中山多情花心便否定他對革命的貢獻，但我們會因為蔣介石自私抗日而質疑他的政治誠信和認受性。

以前抗爭、革命電影在香港都被視為票房毒藥。近年《向政府說不》、《一切從廣場開始》、《逆權大狀》口碑都不錯，於是開始有人問：何時有香港自己的抗爭電影？方育平多年前拍了一部《舞牛》，裡面有黃秋生在中銀下扮紅衛兵的畫面，許鞍華拍過《千言萬語》，它們都被批評不夠立體。前年短片《三月六日》（導演黃進）得了IFVA獎公開組金獎，展示了幾方面的論述，但那只是多元，嘗試面面俱到，還未做到立體。

大時代中，我們在等待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世強

影訊

講好故事 提升電影水平

第23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電影論壇早前在蘭州開幕。來自香港、台灣、北京、上海等地的30餘名電影產業研究、創作研究以及跨媒介研究專家學者，圍繞「中國故事與中國夢」的主題，對中國當下電影的創作現狀、人文精神的傳承、電影中的平民敘事、網絡時代的電影特質以及中國故事的敘事戰略等內容展開研討，倡導以講「好故事」提升中國電影創意空間和全球語境下中國文化的銀幕魅力。

在研討中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黃式憲指出，當今中國電影市場多為「娛樂快餐」式的平庸之作。面對銀幕，觀眾最渴望就是想看一個好故事，建議藝術家要從本土資源入手，從生活中提煉精湛而不落俗套的素材和情節，使故事

具有懸念和張力，跌宕起伏。此外，要善於將創作主體的情懷滲透於敘事中，使故事散發出蕩漾心靈的衝擊力，昭示作品獨特的主題意蘊和美術價值。

而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李相認為，描寫草根平民的生活、反映小人物的喜怒哀樂，是中國電影故事創作的傳統，相對於那些偉大人物的宏大事件，小人物的「中國夢」更為真實具體，他們的夢反映出民眾的訴求，希望湧現更多表現草根一族生活的影片，全方位展現中國社會面貌。

為整合產、研、創資源，此次論壇還首次推出以「中國夢」為主題的「中國電影創意促進計劃」。經過近半年的創意徵集和評估，六個優秀創意項目脫穎而出，並在此次論壇上與投資方簽署投資協議，打通了優秀創意與投資方的對接通道，完成首輪融資。